

理念与行止：
黄榦研究

■单晓娜 / 著

武汉纺织大学人文社科文库

(第三辑)

理念与行止：黄榦研究

■ 单晓娜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念与行止：黄榦研究 / 单晓娜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4891 - 4

I . ①理… II . ①单… III . ①黄榦(1152 ~ 1221)—哲学思想—
研究 IV . ①B244. 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884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田文

责任编辑 徐申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出 版 * 中 国 社 科 学 出 版 社 *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lib.ahu.edu.cn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武汉纺织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序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段话，出自史家陈寅恪笔下，已渐成学界之共识。赵宋文化之辉煌，表现为理学的形成与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教育的发展推动文化的大普及，史学以及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等等。就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理学而言，先后有濂、洛、关、闽诸流派，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诸大家。尤其是朱熹承先贤之余绪，以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竭其一生精力，完成《四书章句集注》等传世之作，重建儒家的价值权威，为世人确定安身立命所当遵循的伦理规范，其建树最为卓越。

朱熹的理学体系博大精深，要对世道人心发挥作用，绝非朝夕之功。其中间环节，一是要大力宣扬，二是要诚心践行。朱熹的弟子和信徒，不少人以宣传和实践理学思想为己任，而将二者结合最为完美者，莫过于既是他的弟子又是他女婿的黄榦。黄榦自入师门，虚心求学，几十年之间，黄榦志坚思苦，以朱熹道德性命之旨砥砺身心言行，深得朱熹倚重。朱熹临终前一日，给黄榦写下最后一封信，念念不忘为“道”著书和以“道”托人：“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托在此者，吾无憾矣。”这是朱熹为整个理学阵营留下的传道遗嘱，体现了他对黄榦的高度信任。

黄榦果然不负朱熹之托，在传道中不遗余力。其《勉斋集》中，留下了《论语通释》《孟子讲义》《孝经本旨》《勉斋讲义》等著述。他参与编撰《朱子语录》，留下数篇序言。为了完成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这一未竟之作，黄榦做了大量的修正和补充，《丧礼》篇他“是一个创始者，也是一个完成者”。尤其是在朱子学经典化的过程中，黄榦撰写出确立朱熹儒家道统地位的《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叙述朱熹生平学问和政事的《朱子行状》，光大师门，影响至为深远。

在社会生活方面，黄榦是一位理学实践者。几十年的仕宦历程中，他主要是任地方官，有时也出任军队职务，各项职事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甚至为之积劳成疾。他曾任汉阳知军，从《勉斋集》可见，他把关心民众疾苦、解决民众困难放在首位。关于城池建设、灾年发放平价粮谷、土地调查、乡村机构设置等方面的文字，留下不少。在民众生活稳定之后，他重视教育，《汉阳军学孟子二十章》即写作于此时。黄榦还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最主要的表现是疾恶如仇。一些自称读圣贤书，又曾身居官位的人，在乡间欺负寡弱，强占民田，黄榦遇到这些案情，必定要彻底调查，弄个水落石出，处置绝不心慈手软，不惜开罪于豪门。读过《勉斋集》的人，对此一定印象深刻。

张载有段名言，被奉为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黄榦宣扬孔孟学说，诠释朱熹主张，这不是“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吗？黄榦关心百姓疾苦，为百姓申冤，这不是“为生民立命”吗？说黄榦“为万世开太平”或许太过，但黄榦所在的理学群体探研世间大道，积极实践，不是意在“为万世开太平”吗？这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是值得后人“同情的理解”、大书一笔的。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单晓娜博士有《理念与行止：黄榦研究》之作。

晓娜是河南南阳才女，于2009年考取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

学专业博士生。因原本有文献学功底，又具备一定的礼学基础，我们在磋商后，确定她重点攻读《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其后，她扬长避短，从“理念与行止”的互动着手，开展黄榦研究，重点不是黄榦如何思想，而是如何行动的。文中从墓志铭、判词入手，揭示宋代理学家理念与行止之间的相互关联，为今人了解宋代社会中思想、文化、政治、社会运动的变迁与演化，提供了颇具特色的个案研究成果。论文提交答辩，得到了各位专家的充分肯定。

时过一年，晓娜将博士论文加以修改，将交付出版社印行，嘱我为之作序，因略述其写作缘由与过程。又因晓娜新近工作为从事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与所学专业不太一致，复有一段赘语。当今时代信息发达，接受西学甚为便利，以致有食洋不化、极端推崇西方主流价值者，转而对中国固有文化取虚无主义态度。他们虽然口中也讲马克思主义，心中却有抵牾。学业传授言不由衷，的确是一件痛苦之事。实际上只要调整心态，转换视角，此痛不难消除。试想西方之主流价值传播者，绝对希望中国既民主又自由，但有几人希望中国既富裕又强大？认清这一国际形势基本格局，立意于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以古代文化精华来丰富当今文化建设，近代史纲要的教学与研究真是大有用武之地。因此，晓娜工作上虽然转了行，学理上却一脉相承。“士志于道”，应该弘扬黄榦的治学精神和处世态度，自觉维护中国数千年的本体文化，引导学生树立为国为民的人生观，开出近代史纲要教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如此传道授业，不亦乐乎！此意不足为外人道，书之文末，亦勘而已。

周国林

2013年7月10日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导言	(1)
一 黄榦与“朱子学”	(1)
二 研究缘起及文献综述	(6)
三 写作构想和研究方法	(16)
第一章 黄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实践	(19)
第一节 自由开放的南宋学术环境	(20)
一 宋学的产生	(20)
二 道学的繁荣	(22)
三 南宋追求道德的士风	(26)
第二节 黄榦与朱熹的交往	(31)
一 师从朱子:志坚思苦	(33)
二 深交朱子:情犹父兄	(35)
三 传承朱子:衍述师说	(42)
第三节 黄榦传承朱子学的著述	(46)
一 《勉斋集》	(46)
二 《论语通释》	(49)
三 《孝经本旨》	(52)
四 《勉斋先生讲义》	(53)

五 《孟子讲义》	(54)
六 《朱子语录》	(55)
第四节 朱子学经典化的努力	(58)
一 确立朱子儒家道统地位的《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	(58)
二 叙述朱子生平学问与政事的《朱子行状》	(71)
三 寄托师门厚望的《仪礼经传通解》之《丧》《祭》之礼	(78)
第二章 黄榦的理想人生和政治实践	(91)
第一节 墓志铭、行状里的理想人生	(91)
一 从事儒业,志在性理之学	(92)
二 事亲孝友,严守儒礼	(95)
三 求圣贤之道,亲践其实	(99)
四 知书持礼,相夫教子	(101)
第二节 黄榦判词里的“理”世界	(102)
一 “承父师之训,得以自明”:不畏强权,致力于改变风俗	(104)
二 “于士大夫则当以义理劝勉”:以“理”服人, 重视儒家伦之情	(109)
三 “安存百姓”“仰体国家”:关注民生	(113)
四 以“理”论夫妇之伦:妇女完全融入夫家	(115)
第三节 黄榦对治国的体认	(119)
一 “爱国忧君”:明义理,正人心	(120)
二 “壮国势而消外侮”:立大本、明大义、克己私、收人才	(121)
三 入幕吴猎府,不惮战事,奔走在穷山绝谷之间	(125)
四 知安庆府,修城筑墙,安民实郡	(127)
第四节 黄榦身为地方官的为政理念与治民实践	(129)
一 道学思想的政治化表现	(130)
二 地方官生涯的事功表现	(140)

第三章 黄榦对朱子学的传播	(157)
第一节 黄榦和他的“同志群体”	(161)
一 为官同道互相推荐与帮助	(161)
二 为学同道之间互相讨论修正	(167)
第二节 黄榦发展道学的思想	(175)
一 发展道学中坚人物	(175)
二 发展门徒,讲学聚会	(183)
第三节 黄榦的努力:信仰和行动的连接	(189)
一 县学、军学理学化	(189)
二 建立道统祠、庙学	(194)
三 书院讲学	(197)
四 社仓的“絜矩”之道	(202)
第四节 黄榦后学对朱子学的传播	(205)
一 金华学派	(206)
二 双峰学派	(211)
三 元代朱子学之传授	(215)
结语	(218)
附录	(222)
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34)

导　　言

一 黄榦与“朱子学”

黄榦（1152—1221），字直卿^①，号勉斋，福州闽县人^②。是朱熹四大弟子^③之一，深得朱熹（1130—1200）嘉许。朱熹弟子众多，黄榦是跟随朱熹时间最长的弟子，又因是其女婿，故和朱子“最为亲密”^④，朱子编《礼书》时曾将《丧》《祭》二礼交给黄榦编写，讲学时请黄榦代讲。叙述朱子一生事迹的《朱子行状》，也是由黄榦撰写，他亦是最有资格撰写的人。

黄榦一生，可以分为求学阶段和从政阶段。求学时（25—50岁）

①（宋）郑元肃录，陈义和编：《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后，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北京图书馆影印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本书主要使用这个版本，参以其他版本。高宗绍兴二十二年壬申（1152）条曰：“先生讳榦，字季直”，据此，黄榦字亦季直。

②《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高宗绍兴二十二年壬申（1152）条曰：“其先世居福州长乐县青山后，后乃徙家郡城之东，为闽县人六世矣。”又参见《朝散黄公墓志铭》，《朱熹集》卷93，墓志铭。

③一般来讲，朱熹的四大弟子指：蔡沉、黄榦、陈淳、辅广。

④清人张伯行在编纂《黄勉斋先生文集》序文时说：“晦翁朱夫子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无虑数百人，独勉斋先生从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之《正谊堂全书》。

好学深思，“志坚思苦”^①，最得朱子真意，为朱子最得意的弟子；从政后（51—70岁）勤政爱民，有志事功，不畏辛劳，鞠躬尽瘁，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一致爱戴。他一生都致力于朱子学的实践与传播，是朱学被接受的最重要的传承者，除了在思想上继承朱子外，在政治、讲学、日常行事上更是勇于实践和传播朱子学，在朱门弟子中是非常务实的。黄榦的经世情怀和实践的普遍性，使他成为南宋道学士大夫理念与行止相结合的一个典型代表。

黄榦的研究是与朱子学紧密联系的。讲到“朱子学”，这里有必要厘清几个概念即“道学”“理学”“宋学”“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程朱学”和“朱子学”。关于这些名词概念的表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宋人程颐开始，到朱熹集大成，至明代王阳明不断完善的这个学术体系，被不同的人冠以不同的名称，部分学者在这个基础上或扩展或缩小它的含义，在当代的研究中，国内外对这些词语的准确性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兹举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冯友兰在其早期的哲学著作中喜欢使用“新儒学”一词，他的用法包含了“朱子学”与“阳明学”。但他后来改变观点，认为在历史原有意义上使用“道学”这一概念，就像它在11和12世纪被使用的那样，还强调学者应该放弃将道学和理学混淆起来的做法。他专门撰文发表这一意见。^②侯外庐、葛兆光等学者在其哲学著述中一般使用“理学”一词，他们的用法一般是指从程颐开始，由朱熹、王阳明完成的哲学综合。陈荣捷对“朱子学”的范围界定是以与朱子本人相关的一切，以朱子为中心进行的研究，而他在文章中用到“新儒学”这个概念时，含义基本上等同于从程颐开始的最后由朱熹完成的哲学

① 《勉斋先生黄文肅公年谱》，宁宗嘉定七年甲戌（1214）条。

② 冯友兰：《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形式》，载中国哲学史学会编《宋明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6页。

综合。^① 邓广铭专门撰文《宋学和理学》和《略谈宋学》，对宋学和理学进行了区别，纠正以前在书写理学史时对宋代学术的定义错误，认为宋学的范围更广阔，它包括理学，同时又包括了理学之外的其他学说，比如包括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苏学，陈亮、叶适的浙东学派等。^② 余英时认为理学和道学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他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他专门讨论了他对理学和道学的看法，他认为理学今天已被用得最广，且以为理学更显客观，因此他觉得没必要争辩其用法，在文中他时而使用道学，时而又使用理学。他在著作中所界定的道学家或理学家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朱熹等人外，还包括陆九渊、吕祖谦、陈亮等这些朱熹的对立派。^③ 高令印在其著作中称“朱子学”为“闽学”，他认为这两者是同义的，可以互相替代的。他所指的闽学是指南宋朱熹在福建建阳考亭所创立的，当时与濂、洛、关等并称的地域性学派之一。同时，高令印也注意到闽学后来发生的转变，它由福建蔓延及全国，在后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起了主导作用。

美国学者对这几个概念进行了很好的探讨。田浩认为“Neo-Confucianism”即“新儒学”一词含糊不清，这个词每个研究者所指不一，说法很多。他更倾向于使用“道学”这个词，认为这个词是原始文献中对宋代学术思潮的一种称呼，比其他的词语更加准确。对此，狄百瑞专门撰文反驳，认为“Neo-Confucianism”这个词更准确地表示了宋代的新思想运动。同时，狄百瑞认为程朱学派属于“正统新儒学”，而其他宋代以来的儒学则属于一般的“新儒学”。包弼德则指出狄百瑞所下的定义不确切，在历史上是没有意义的。田浩也对

^① 参见陈荣捷《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邓广铭：《宋学和理学》，载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略谈宋学》，载邓广铭《宋史十讲》，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③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页。

此作出回应，认为狄百瑞的定义是含混又多歧。^① 田浩进一步对宋学和道学的意义进行了探讨，在他的著作《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宋学（包括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的学说）较宽泛的意义被保留下来用以指称宋代的儒学复兴。而“道学”这一概念则在12世纪时被用来指代宋学中特定的一支。田浩认为将“道学”看做一个群体的做法是更加合理的。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在《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中对“Neo-Confucianism”一词的视角进行了探讨。他更同意田浩的看法，认为“道学”这个词比较“Neo-Confucianism”一词，意义范围更加广泛和准确，他认为如果使用“Neo-Confucianism”一词的话，朱子学范围之外的不少重要思想家可能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被忽视不理。他对“Neo-Confucianism”一词进行了专文考证，认为“Neo-Confucianism”这一概念，其起源比一般的说法更早，而且其所指的范围从开始至今都专指朱子学，有时包括扬弃朱子学的阳明学在内。他认为这些“正名”的争论反映出研究视角上的重大分歧。^②

本书所谓的“朱子学”，是指以朱子本人的著作、思想和行为为主，以朱子门人和后学对朱子著作、思想和行为的阐释、研究和传播为辅的专门学问。它是由朱子集大成，包括以朱子思想的形成、研究（或称为阐释）和传播等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学术体系。朱子的空前成就对以后的学者有很大的示范和启发作用，在这一学术体系内，他留下了无数的工作让后人接着做下去，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传统、一个新的学术体系即朱子学体系，或称为“学术典范”。这一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即相互独立又互相关联。也正因为朱子学足以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典范，所以，它已不仅仅是一种与当时濂

① [美]田浩：《新儒学与道学之间差异的检讨》，载田浩主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② [日]吾妻重二：《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载田浩主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15页。

学、洛学、关学等并称的地域性学派，而是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学派。从属性上讲，朱子学不仅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也是东亚乃至世界学术史上的重要部分。

本书所讲主要是“朱子学”，但也会用到“道学”和理学。而在本书中，所谓道学，笔者认同田浩和冯友兰的说法，“道学”这一概念在12世纪时被用来指代宋学中特定的一支，将道学成员看做一个群体的做法是更加合理的，而这个群体，主要是指由程颐开始，由朱熹集大成，由王阳明完成的学术体系。在历史原有意义上使用“道学”这一概念，就像它在11和12世纪被使用的那样。而所谓的宋学，本书将会注意到清代“宋学”、“汉学”之争中宋学的意义（程朱义理之学）和现代使用的宋学（有宋一代的学术，包括新学、洛学、苏学等），以及被狭义化的宋学意义（朱子学或程朱义理之学），本书使用宋学时，会谨慎使用，选择现代使用的宋学意义，即有宋一代的学术，包括新学、洛学、苏学等。而书中将会用到“闽学”，主要指福建的一种地域性学派，在朱子学发生过程中，“闽学”基本上等同于“朱子学”，若用到“理学”，一般指程朱哲学体系，若有他指，会做出相应的说明。本书认为“程朱学”的表述大致等同于“朱子学”，若此，基本用“朱子学”代替。由于本书所描述的一般指南宋道学发生初期的道学情况，所以以上概念区别不是很大，有时甚至可以互换，可根据语境使用。^①

在宋以后，朱子学在我国古代社会里影响重大，除了学术领域上

^① 田浩指出：余先生有意回避了道学的争辩，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研究只关心宋代道学与政治文化是如何互动的（卷1，22页）。他也时而表示，道学与理学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与多数学者一样，他时而使用道学，时而又交替使用理学。在有些地方（例如卷2，26页），他注意到宋代已给我们所谓“理学”贴上的“道学”或“道学群”的标签（卷2，26页），而且在宋代史料中，道学（而不是理学）是更常见的术语（卷2，101页）。尽管如此，他仍指出，理学今天已被用得最广，且以为理学更显客观，因此他觉得没必要争辩其用法。参见田浩《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第103—107页。本书同意余英时先生的观点。

的影响外，大到治国、教育、科举、国家政治，小到修身、婚嫁、丧葬、市民生活等，无一不受到朱子学浸染。朱子学在不同朝代的主要境遇和功能的不同，尤其在朱子歿后几百年间，其学说由民间学说转变为官方学说，由地域性学说转变为全国性学说，其学说的性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成为元、明、清、三代的显学，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本书的研究将更多偏重朱子学发生期南宋的情况。

在朱子学研究方面，前辈学人对朱子学的研究很多^①，大多都从思想、哲学、政治和学术的角度进行考察研究，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关于朱门弟子，作为朱子学本身的研究，也大多是从上述角度进行的。本书以黄榦为中心进行研究，因此，一方面本书应该属于朱子学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本书也希望有所拓展，视角注重考察以黄榦为代表的南宋道学士大夫的理念与行止的互动。

二 研究缘起及文献综述

孟子曾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②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不了解他在实际生活中的行止，很难说是圆满的。余英时曾说过：

理学家和职业官僚同是士大夫，在仕宦经历方面完全相同，都是科举出身，然后由县主簿或县尉之类的地方小吏起家。朱熹如此，陆九渊如此，刘清之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自别于职业官僚而自成一政治团体者，分析到最后，还是由于他们继承了北宋

^① 参见林庆彰编《朱子学研究书目（1990—1991）》，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杨儒宾《战后台湾的朱子学研究》、陈荣捷《欧美之朱子学》，载《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日]吾妻重二《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载田浩主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29页。

^② 《孟子·万章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0页。

以来儒家关于重建“治道”的关怀。所以理学家在朝廷则念念不忘“得君行道”，在地方则往往强调“泽及细民”。^①

余英时在此论及理学家有以下观点：（1）自成一政治团体者；（2）继承了北宋以来儒家关于重建“治道”的关怀；（3）在朝廷则念念不忘“得君行道”；（4）在地方则往往强调“泽及细民”。以余英时为代表的以往的研究，对前三点都有较详细的论述，但对于第四点，余先生论述较少，而对于大部分道学士大夫来讲，他们并不是都有机会在朝廷上“得君行道”的，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地方为官，其“泽及细民”的情况如何，他们在地方上是如何结成“政治团体”的，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有待研究。如：南宋的道学家们，以道学思想而闻名于世，他们的理念不仅仅表现在宏观的政治领域，在他们当时生活的社会中是如何体现的？体现了多少？理学思想对社会风俗的改变有多少？对当代社会和后世社会有何影响？它们又是如何互动的？朱子作为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后人能达到朱子那样成就的微乎其微。相对而言，朱子学实践问题的研究，其弟子更具有代表性。其弟子的一切理学实践活动更能作为大部分理学家的代表。

本书选择黄榦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和基点，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揭示黄榦的道学实践等，试图揭开作为道学家的宋代士大夫的思想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关联的一角，道学思想和实践行为是如何互动的，探讨这个群体的社会实践，希望以原始文献为基础，通过对黄榦道学实践等的研究，尽量重现南宋道学家道学实践的历史现场，补充南宋道学实践、传承等方面的研究。

自南宋至清，古人对黄榦的认识和评价，与朱子学的广泛普及是分不开的。学者对黄榦其人和其文均给予了较高评价：

^①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82页。